

评论

回应民意期许
终结立体污染

李晓亮

在大气、水质、土壤一体化的污染格局下,无人能独善其身。土壤污染信息,绝非什么国家秘密。同理,所有的公共环保信息都应尽量公开,所有产生污染的温床和土壤,都应竭力铲除。我们倾力关注环保议题,不仅是外在的审美的需求,也非领导的政绩需要,而是最强烈最执着的民意使然。宜居和谐的生存环境,是环保的唯一目的和我们的最终要求——面对这沉甸甸的现实,哪个部门还好意思再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布那些事关全国民众健康权的污染信息?

前一段,长治水污染,市长去职,一共38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这也被视为十八大后的治污的一记重拳。对环保问责,权力纠偏的民意期许,两会理当回应。而这种回应不是像某些地方环保部门急着登整版广告表功,而是当辅以制度革新,当问责

制度化常规化,让环境维权成本降低,有法可依。恶性污染事件,涉事企业应该承担“惩罚性赔偿”,要罚疼它,而不是隔靴搔痒。

这就有待《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规的适时修订增补,适应新形势新需求。而两会正是全国各界精英汇聚,共商国是的最好平台。这时达成共识,并力促落地执行。所幸,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利好消息:“综合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等建议被采纳”、“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履行职能的重要着力点”。

希望今后的环保执法,能力挽狂澜,缓解目前窘境。碧水蓝天,海晏河清的环境,更为可期。摘掉防尘口罩,防毒面具啥的,自由呼吸清新空气。

两会开幕,环保生态问题,自然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一大焦点议题。这当然是因为最近环保事件频发,从空气到水质再到土壤,都时有污染消息传出,几乎是被水陆空全方位污染阴霾所裹挟。(3月3日新华网)

微评论

局长的眼泪
唤不回国产奶粉信心

刘义杰

3月2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来到政协经济界驻地报到。见到《潇湘晨报》记者,“老省长”热情地伸出手来。他刚刚答应记者的“专访”要求,立即就引来了大批媒体的“围攻”。谈到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周伯华几欲落泪。(3月3日《潇湘晨报》)

没有对官员和企业的追究,信任根本就不存在立足的土壤。正如一网友所言有“责任不可怕,没信任才可怕”。换句话说,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信任不是凭空就产生的,它需要相关部门用实际行动,用诚意来换取。工商总局局长在对食品安全的回答中说“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期待通过部门整合和修订《食品安全法》来挽回公众的信任,当然,食品安全的发生有着太多的理由,但有一个理由却永远无法绕过,问题再多,再难,为何却鲜有几个严惩的典型呢?

写到这里,想到了官员的反腐上,官员腐败问题需要制度的建设来铲除,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制度建设的同时,反腐并没有停滞,成绩也显著。由此来说,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建树,倒有些寒酸得让人掉泪的意思。所谓空谈误国,何尝不包括食品安全呢?

临汾40座“五星级”
公厕是如何审批的

邓陶军

山西临汾遍地是古迹,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但走在临汾街头,你见到的外观设计成故宫、鸟巢、城堡、大院的建筑,是“五星级”公厕。从2008年到现在,临汾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标准化公厕160多座。其中,已建成标准化公厕60座,五星级标准达40座,四星级标准12座,每年的管理费用达300万元。(3月3日《东方早报》)

兴建“五星级”公厕与“华夏第一都”有何关联?一个地级市是否需要那么多的星级公厕?建造公厕目的在于便民,在于城市卫生管理与文明程度的提升。提升城市形象就公厕建造而言,并不在于公厕有多豪华,而在于公厕的布局是否合理,卫生管理水平是否到位。

公厕外观设计像故宫、鸟巢、城堡、大院有没有必要?标准化公厕就专指豪华奢侈吗?这样的标准是由谁制定呢?单从每年的管理费用达300万元来看,这些所谓的“五星级”公厕就是好看不实用,与地方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就算经济水平如此了得,也不应大兴豪华之风。

建造几十座的豪华公厕并非个人出资,也非捐赠得来,所有的支出都要从财政解决。而这些项目是如何通过当地政府审批的?不管地方财政是否有钱,总不能乱花钱。花钱随意,挥金如土,钱用不到点子上,这些是谁给的权利呢?

大兴“五星级”公厕本质上与建豪华办公楼没有多大区别。什么样的钱该花,什么样的钱不能花,难道都没有一个度,心里都没有谱吗?像这种公厕建造项目的审批存在着管理问题,其出发点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实用的不建,不合理的浪费该抵制,烧钱歪风不坚决遏制,还谈什么发展呢?

时事
乱炖

今年3月5日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学雷锋日”临近,泉城爱心涌动。这个周末,不少学校的师生自发组织去济南各大养老机构献爱心。(3月3日《济南时报》)

谁来公布“学雷锋”的“信息和需求”?

郭文斌

“学雷锋”扎堆,其实是难免的。但“爱”却不该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该是让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老人都能够享受到“学雷锋”带来的“阳光”。更重要的是要有长效机制。或许一些人“学雷锋”只是一时心血来潮,但这并没有关系,如果能在第一次的“学雷锋”中感受到了爱,可能以后成为“学雷锋”的积极分子,并且慢慢变成“志愿者”。

“学雷锋”的“爱”该分到每一个需要的老人身上。这就需要有一个公布“信息和需求”的平台。如果一些老年公寓的“爱”多余了,不需要了,可以在这个平台说明,哪些老年公寓的老人还没有享受到“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说明,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更多“学雷锋”者清楚,究竟该去哪儿“学雷锋”。其实,如果有一个双方能够沟通的平台,老人需要怎样的形式“学雷锋”也可以说明。



一年等一回 王恒/漫画

这样“献爱者”和“受爱者”经过了沟通之后,“学雷锋”就显得更加有意义。要不然,享受到“多余的爱”的老人觉得难受,而那些“学雷锋”者也觉得不爽快。当自己奉献出来的“爱”竟然是别人不需要的,那是多尴尬的事。

时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报告称,中国已基本具备征收遗产税条件,开始征收遗产税时机已成熟,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3月3日《京华时报》)

开征遗产税不宜一刀切

钱兆成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富人税”,该税种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也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对遗产税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该明确一点,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效果,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财富所有人的过多财产进行再分配,限制财富过分集中,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

因此,应当树立和坚持遗产税是“富人税”的观点,坚持高起征点原则。目前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工薪阶层,起征点应该高于他们的家庭总资产,从而才可以将他们排除在外,不会对他们造成冲击。

而以500万元起征,如此一来一线城市所有有房产的居民离世后将会给子女留下沉重的税负负担。以目前均价每平方米3万多元为参考

基准,一套房屋的价值恰好在500万元之间。这就意味着,一线城市的有房居民很有可能都要被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如果起征点一成不变,500万元在几十年后可能早已经不是众人眼中富人的标准。

由此可见,一刀切式的起征点并不科学,全国不应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征收遗产税,还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根据地区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对于继承人用于居住的住宅等不动产,出于平衡的考虑,应准予在一定范围内扣除。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现实情况,参照人民生活水平,规定扣除额。鉴于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相差悬殊,应建立一个以各省(市、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参数的扣除体系。

当然,由于遗产继承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不可过高,过高则易使财产所有人形成不良财产观,在生前大肆挥霍、浪费财产,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那样将会适得其反。

“以前来开会,天天晚上有饭局,还要喝酒。每天晚上都有饭局,实在很辛苦。饭局让委员们开政协之余,还要开联谊会,不能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于提案。”

连任的政协委员段祺华说,会风之变,除了没花、没条幅,最大感受是没“饭局”。

“如果不让申纪兰当代表,估计山西老百姓反对的声音会更大。”

今年81岁的申纪兰是唯一一任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2月,她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曾引起公众对其履职能力的质疑。3月2日,山西省委宣传部长胡苏平向媒体解释说。

非常道